

# 传说的多元一体格局及表现的民族精神

□李建中



彝海结盟(油画) 沈尧伊作

传说,是介于神话和故事之间的一类民间文学作品,具有信实性、附着性和地方性特点。一个民族的民间传说,是这个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具有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各民族传说的“多元一体格局”。**四川是一个多民族大省,除汉族外,还有彝、藏、羌、苗、回、蒙古、土家、傣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羌族聚居区和第二大的藏族聚居区。四川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并较好地保留了自己民族古老的、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充满传奇色彩的各类民间传说,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是保存他们珍贵历史文化资料的重要载体。四川少数民族传说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包括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传说卷编纂体例”中列出的全部类型。

川西北高原地区和川西南高山地区,自古就是汉、藏、彝、羌、苗等多民族共生互动、交融凝聚的区域。所以,各族民间传说之间存在大量的借鉴痕迹。不少传说明显是从汉族文化流传进来后被重新加工形成的,从而出现了许多大同小异或有同有异的“民族版本”。像鲁班的传说,在苗族、傣族、土家族中均有流传,充分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彼此交融和影响。当然,这些传说在进入某一民族后,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如采录于宝兴县的藏族传说《穆坪人本朱洪武》,直接将朱元璋的出生地、族别都纳入本土、本民族之中。

同一传说传入不同民族后形成同中有异的民族版本,充分体现四川各民族自古以来互动交流、繁荣共生的历史发展过程,充分显示出四川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变异,不可分割”的多元一体格局,反映了四川地区古老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充分表现民族精神的人物传说。**四川少数民族的人物传说,无不彰显着该民族的民族精神。

彝族生活在高山、深谷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奴隶社会制的封闭状态中。艰苦的环境和奴隶制的桎梏,一方面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却也养成了彝族人民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坚韧的奋斗精神。彝族人物传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强者和智者,他们或出生不凡,或力大无穷,或智慧过人,虽历经千难万险却总是勇往无前。《施纳威特寻父记》,真实、形象地反映了从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阶段的社会变迁。施纳威特来自亲生儿子不见父,他决心去“寻父”,在历经坎坷后,最终实现了人世一妻配一夫、生子能见父。毕阿史拉则找水、救人、过河、擒虎、收拾熊黑、创造并传播文字等一系列传

说,把一位聪明智慧、法力无边的彝族先贤塑造得栩栩如生。其他如意底索夫、罕亦跌古等人物传说,均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彝族人民藐视神灵、驯服万物、战胜自然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

格萨尔是藏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其传说在甘孜、阿坝、凉山三州藏族广泛流传。传说讲述了格萨尔从出生成长、娶妻成家到降妖除魔的神异事迹及种种功绩,充分表达了藏族人民勇敢顽强、英勇善战、抑强扶弱、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达里仁扎勇杀英军》讲述的是一百多年前一支英军入侵西藏时,来自四川木里县的青年喇嘛达里仁扎勇杀英军,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反映了藏族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藏族宗教人物传说数量众多,这些传说中的主人公,或传播科技,或修桥建房,或乐善好施,对藏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传说,既表达了藏族人民对其促进藏汉和平交往功绩的由衷赞叹,更表明了“汉藏一家”的思想深入人心。

羌族传说中的历史人物,首推治水英雄大禹。大禹被羌族人视为民族英雄,在羌族地区留下了大量传说,讲述了他导江背岭、镇龙降魔等等事迹,歌颂了他公而忘私、英勇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

**全面展现地域特点的风物传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山川地貌、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独具特色的工艺特产,为风物传说的创造和传播奠定了深厚基础。各族劳动人民在农耕、放牧和狩猎中,运用富于幻想的手法,把身旁的自然物或人工物加以历史化、拟人化,创作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风物传说。

在山川传说中,既有闻名遐迩的金沙江、四姑娘山、九顶山等名山大川的传说,也有沙马甲谷水洞、萝卜寨等区域性地方传说。这些传说,无不将神奇故事的发生过程紧紧附着于当地的山川河流,给人以极高的可信度。《四姑娘山的来历》讲述了四位善良的姑娘化作山峰后还常常帮助山脚下的穷苦老百姓,保佑他们无灾无病、风调雨顺的故事;《九顶山的来历》说九顶山是西王母的九个女儿来到人间除魔,为了顶住妖魔吹出的冷风而站成一排变成的。

各民族的动植物传说,往往与该民族居住环境中的生物种类及习性紧密相连。人们按照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对动植物的来历及其习性在传说中做出了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阐释,借传说惩治和鞭笞坏人,同情和颂扬好人。在彝、藏、羌、傣等民族动物传说中,关于狗的传说比较多,充分体现了人、狗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民族长期居住在高山地区,周边生存着诸多野生动物,它们既对人们造成生命威胁又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人、狗之间的紧密关系是长期生活中的双向选择。青稞

作为藏族地区独特的、主要的粮食作物,相关传说讲述了青稞的来之不易,启示人们要爱惜粮食、感恩天地自然的馈赠。

节日风俗传说中,彝族火把节的相关传说流传极其广泛,《火把节的来历》等作品,从多方面、多角度解释了火把节的来历和相关习俗形成的原因,贯穿了人能胜天、人能胜神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与彝族邻近的白、傣等民族都有过火把节的习俗,也都流传着火把节的传说。这些传说,既体现出不同民族火把节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征,也体现出各民族间民俗文化的彼此影响和相互交融。

**真实反映民族记忆的历史传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有关历史事件和文化记忆方面的传说中带着浓厚的原始色彩,甚至还保留了不少原始民族的痕迹,可以从中找到人类氏族社会末期的历史影子 and 线索。

像彝族历史传说中,便有关于祖先大迁移的传说,讲述彝族远古古侯、曲涅带着族人,历经艰辛,辗转来到了今天的大小凉山一带。三国时期蜀国孔明军队与以勒格诗为首领的彝族部落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系列传说,在凉山彝族地区广泛流传,是彝族人民独特的“三国记忆”。这个系列传说结合当地风物,涉及的内容极广,既显示出诸葛亮超人智慧,也反映了彝族部落首领的勇敢质朴,更拉开了彝、汉民族团结的古老序幕。

藏族传说《乾隆王打金川》,是附着在历史事件上的传说。作品除对乾隆派军队攻打金川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民间叙述”外,还对现在金川县的少数民族大多数住在高山半山、汉族住在沿河一带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羌族关于文化记忆方面的传说不少,《羌族为什么迁来四川》中说,羌族是从西北黄河流域一带迁来的,作品既说明了羌族后来没有文字的原因,也反映了羌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值得一提的是,《羌人远征抗夷》讲述了鸦片战争时期一支羌族队伍赴东南沿海抗击夷人侵略的故事,充分反映了羌族人民热爱家乡、保卫祖国的家国情怀。

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经过了四川彝、藏、羌、傣等民族地区。后来,《彝海结盟》《徐向前在崇化》《阿牙玛莫二看红军》等传说在这些地方的民众中产生并传播开来。这些传说虽不是信史,却以信史为基础,是当时红军队伍团结广大人民真实斗争和真实生活的折射与反映,生动诠释了红军为民族谋幸福、各族人民一家亲的理念和民族政策,讲述了各民族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系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四川卷·民族分卷》主编)

民俗学界一直对作为民俗研究基础的资料搜集非常重视,钟敬文早就提出民间文艺学研究中资料学的重要性,强调“我们的资料是要通过田野作业去获得的”“应注意到用文献学的方法来搜集资料”,提出了“民俗资料学”的概念。民俗资料学对民俗资料的界定与分类关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浩如烟海的以各类形式、各类媒介存在,掌握在各个人群中的鲜活资料,将其纳入整体的学术视野进行观照,回归到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初心,对于学科积极回馈社会、发挥自身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山东卷》的过程中,编纂团队发现山东的神话资料相对匮乏,“三套集成”县卷本较难收集,收集上来的县卷本中神话文本又相对较少。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团队有意识地吸收民俗资料学的学术理念,赴青岛、聊城、济南、菏泽、济宁、泰安、枣庄、潍坊、临沂、烟台、威海、德州等地考察神话在当下社会的实际存续状况,在民俗资料学的视野下更加广泛地搜集神话资料,为编纂任务的高质量完成打下了基础。

《大系·神话·山东卷》主要是对转化为文字的“现代民间口传神话”进行搜集整理,但《大系》还同时在编选标准上提出了要“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要求,“入选作品必须在地区、民族、内容、形式、风格、类型等方面有代表性,能够反映民族风格和口承传统与特点”。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团队成员发现不只是“三套集成”县卷本中收录有神话文本,在很多其他文本中也能发现较鲜活的神话文本,虽然并不是所有与“神话”有关的文本都被收录,但它们作为民俗资料对于“提供更多准确翔实的资料和鲜活透彻的个案”,以使编者对山东神话的整体状貌和地域特点有更宏观的了解和认知确是有积极意义的。概括说来,编纂团队主要从以下材料中搜集和整理神话文本。

**一、正式出版的民间文学资料。**记载山东神话的已出版的民间文学资料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在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还没有开展之前,就有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民间,搜集到包括神话在内的文学作品结集出版。这类资料如董均伦、江源伉俪出版的《找姑鸟》《奇异的宝花》《聊斋汉子》等均有对神话的收录,这些神话文本搜集整理质量高、代表性强,代表了山东神话口承文本的较高水平。第二类是陆续出版的“三套集成”县卷本、省卷本。县卷本分布在不同年代出版,时间跨度较大,而且呈现出一个总体特点:除了专业机构集中编纂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之外,其他书籍均是出版时间越靠后,神话文本附带的讲述者、采集整理者、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等信息缺失越多。但总体来说,这些神话文本基本是文化工作者从民间采集而来,具有明显的口承神话特点,还是较为理想的可选项。第三类是进入21世纪后,各地出版的有关民间文学书籍。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较少在民俗学理论的指导下编纂完成,因此编纂质量不一。

**二、未出版的“三套集成”资料。**由于多方面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县卷本成果有很多并没有出版,大多只是被结集印刷,以“资料本”的形式流传于世。编纂团队在对山东省各县市的民间故事县卷本进行搜集过程中,共找到未出版的故事集成县卷本150余本,其中收录有“神话”文本的有60多本。这些县卷本中的故事文本虽然也有“组织化”“脱域化”等表现,但仍然“具有完整的自在的学术价值,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元文本和多种可能性”,也为山东神话留下了最为鲜活直观的口承资料,绝大多数县卷本中的神话文本为当时民间文学工作者从民间采集而来,客观反映了山东神话的实际传承状况。有少部分文本具有“借鉴”“创作”等倾向,需要进行一定的甄别、遴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县县编人员对“神话”概念的理解不一,很多当时被列入“神话”类别之下的文本从狭义神话概念去审视的话并非“神话”,很多是“神话”的文本被列入“传说”等分类中,需要编纂团队细致阅读文本,从全书中进行筛选。如在山东流传很广的“二郎担山赶太阳”“牛的来历”“麦子为啥一个穗”等神话大都是在“传说”的类别下被找到的。

**三、地方史志。**要系统了解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整体状况,就必须收集当地的史志资料并进行阅读和学习。山东很多神话质素就是在地方史志中被保存下来的,后来在合适时机被后人唤醒,以民间文学、文化景观、文创产品等多种方式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山东神话在地方史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神话质素,如神话人物、神话遗迹、地方风物等方式零星被记载在明清以来的县志中,这些记载成为后来人们进行口头讲述与文化生产的重要依托,是神话能够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根脉所在;一种是在新修的行业志、村志中对具体神话文本的保留,如《济南水利漫话》就收录了“舜井”这一则文本,潍坊市《崔家村志》收录了具有地方和行业特色的“磨祖生嬷嬷的故事”,这些被记载于史志中的神话质素或文本对于丰富山东神话的多样性具有一定价值。

**四、口头文本。**这里所说的口头文本是指经过当代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训练的学者或收集者进入到当代百姓生活中采集整理的神话文本,在《大系·神话·山东卷》中,这类文本是除“三套集成”县卷本中的神话文本外,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文本。自2009年开始,编纂团队就开始对山东神话进行零星的学术调研,2021年接受中国民协委托编纂山东神话卷的任务后,开始较为系统地调研山东神话的口承状况,搜集整理流传于民间的口承神话文本。编纂团队先后对青岛崂山、巨野蚩尤、曹县火神庙、菏泽祖源文化研究院、烟台蓬莱、青岛韩家民俗村、诸城舜墓、青州东夷文化园、寒亭嫦娥塑像等地进行了学术考察,寻找神话讲述者30余人,搜集整理神话文本80多篇。编纂团队还在课堂上教授学生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组织学生调研自己家乡的神话,并将其转换为文字文本,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大学生搜集整理了自己10余篇质量较高的神话文本。

**五、报纸上的文本。**一些报纸为了传播与弘扬地域文化也会“发表”一些神话作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神话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传播性和被权威“背书”的过程,也经历了地方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审视与检验,具备了地方文化认同的特征。因此,编纂团队也遴选了一些作品收入《大系》之中。如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黄帝诞生”“黄帝好客”,发表于《大众日报》的“黄水干了立人烟”,发表于《济宁日报》的“尧王坟”“舜耕历山”等。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神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是指在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的过程中,地方搜集整理的神话文本。如枣庄的女娲神话,济南历下区、潍坊诸城市的大舜传说,菏泽牡丹区的尧舜传说,宁阳县的大禹治水传说等。编纂团队从非遗申报文件中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神话文本,如“盐宗夙沙氏煮海水成盐的传说”“玉帝尝盐”等。

此外,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编纂团队还对与神话相关的考古图像、庙宇壁画、神灵塑像、现代壁画、数字文本、数字影像等承载神话的自然与文化景观、数字媒介等素材进行搜集整理,对传统庙宇和陵墓、地方风物、现代景观、文化标识等与神话有关的事项进行了实地探访,这些工作对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从学术上自觉以动态和开放的视角,特别是在整体时间观和流动的互文之网中重新理解神话和神话学提供了支撑。

(作者系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山东卷》主编)

# 民俗资料学视野下山东神话文本的搜集与整理

□张成福



# 歌谣抒情传统再梳理

□夏敏

抒情从来是歌谣的首要特征,道理看似浅显,歌谣的抒情性却常因其“理所当然”而被研究者忽略。学者们通常关注歌谣的语言形式、历史文化语境、传唱内容及主题,而对于抒情的动机、情感的浓度、抒情特征与价值,却少有人关注。其实,歌谣是为达到抒情的目的而存在的,人们通过抒情来缓解压力,转移注意,歌谣的演绎能够起到文学治疗的作用。《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嗷叹之,嗷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谣情感抒发的特点,即使到了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谣”而“歌”的特点不变,原因很简单,歌谣是用来抒情的,抒情特征从来没有褪色。

我曾做过一个线上调查,“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在线歌曲?”选项中“民间歌谣的现代改编”获得了73%的最高占比。这至少说明,现代生活中人们排遣郁闷、打发时间、抒发情感、休闲娱乐的歌唱,最看好的还是辨识度较高的传统歌谣。我在整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福建卷》的时候,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传统歌谣之所以能被不断传唱、演绎,主要在于它的抒情功能。但是抒情是讲究传统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群体,都有各自特定的抒情方式和习惯,或者说有各自的抒情传统。歌谣传承时,抒情传统需要被特别尊重。2022年底我前往观赏某县文联举办的童谣演出,原本只是念念有词的“谣”,到了舞台上都被谱上曲子来演唱,改编者说是为了传承方便,也是体现“创新”,这样做却违背了歌谣在本地的抒情传统,老百姓并不认可。座席一侧的一位长者称这些歌谣唱出来虽是新变,但不合本地歌谣“只念不唱”的传统。

歌谣是诗的先声。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四种诗的功能,其实就是歌谣的情感抒发功能。调动人的情绪,维系同仁情谊,批评针砭时弊,皆由歌谣唱诵和传播者的情感力量来推动。《诗经》以“风”指涉歌谣,有了“风闻”,必有“跟风”。歌谣之所以喜闻乐见,

皆因其群体投入的抒情功能。前几年,在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群体中生出一种致力于复兴“家乡”方言的演唱行为。同一个地域群体或方言群体,用其共有的“歌谣”来温暖彼此,唤醒乡土记忆并实现族群认同,是抒情传统的魅力之所在。同唱一首乡土的歌,也是对文化区域性、丰富性、多样性的“抒情性维护”。同样的方言歌谣,让同样在外打拼的家乡人找到了抱团取暖的“知音”。这些方言抒情,既是传承的,也是创新的。

这种传承,是固有抒情方式在异地的传承与延伸;这种创新,是固有抒情方式在异地以新的媒介(如歌友微信群、自发组织的电声乐队)用家乡话讲述打工地新的生活内容,例如广东五条人乐队用海丰话创作的《道山靛仔》等歌曲受到广东内外潮汕话群体的热情追捧;广东九连真人乐队的客家话歌曲《凡人歌》《莫欺少年穷》等也唱出了海丰客家同乡的多情。舞台上下的歌谣群体性唱诵,实现了“共情”。

我们在《大系》编纂过程中关注到一些乡土文人甚至还会主动搜集歌谣、记录歌词、灌制唱片、带徒授艺,来体现他们对本土歌谣的钟情。类似做法由来已久。清末民初,福建霞浦白露坑人畲族歌王钟学吉曾在霞浦开设过山会馆,成为畲歌歌本汇集与传播的重要场所,类似于今天的民间歌谣传习中心。钟学吉不仅编写了数百首小说歌(如《末朝纲》《九节金龙鞭》等),而且自觉整理了大量畲族民间歌谣。如果缺失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对本民族抒情传统的无限珍爱,他就不会有这种存续歌谣文化传统的远见卓识。

说到歌谣群体性的抒情传统,必然要追溯歌谣的源与流。歌谣中最早的抒情表达或与仪式有关。人们借助抒情以调和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用仪式里的抒情抚慰日常焦虑与不安。《诗经》专辟“颂”诗,意在强调抒情的仪式功能:“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秬。为酒

为醴,絜粢絜粢,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周颂·丰年》)。这种去日常的仪式抒情,说明抒情(咏诗)曾经是人从世俗“分离”出来,进入人神相交的“阈限”期集体约定的一种仪式与义务,融入抒情(赞美)和祭品(酒醴)以表达对神赐丰年的喜悦和对荒年不安的抵御,说明仪式抒情曾是人神关系的一种调和。回到日常后,人把抒情用在人与人之间,其目的仍不脱抒情的符号建构性质。由此,可将歌谣的抒情传统区分为民间生活中的世俗抒情(如情歌、号子)和仪式抒情。其间没有截然的边界,只要生活需要它们,抒情就开始了。

与文人抒情相比,歌谣的抒情是最不拘套路的。歌谣的抒情者和抒情的接受者更在乎“即兴”中非同寻常的新鲜表达,每一次抒情,都是符号的重新洗牌和建构。

哥是山中千年树,妹是山中万年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闽西客家民歌)

四个句子的语词平常不过,不可能像王安石那样在“绿”的取巧上咬文嚼字,但经类似于“文字游戏”般的排列组合(“树死藤生”“藤死树生”)后,这首民歌体现出来的“诗性智慧”,却让人感受到抒情符号有序化“建构”的无穷魅力。

《大系》的编纂,为我们重新审视歌谣抒情传统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契机,也为诗学理论的再反思提供了更多可能。

(作者系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集美大学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福建卷》主编)